目　录

特约专稿

我和中国托派相处的日子（之一）……斯施云（1）

宗教和反动会道门专题

解放前湘乡宗教状况和反动会道门在湘乡的活动……
……湘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16）
我所知道的紫霞教……杨绽青（46）

宋鹤庚传略……李宝南　黄福祥（50）
我所知道的周伟龙……刘植根（56）
何海清将军二三事……翁愈孚（64）
陈壬林先生的书法……刘海鳌（67）
王季范先生在长郡中学……王器瑚（69）
田伯刚先生办学事迹……潘迪光（74）

我在龙城女师的日子里……旷鳌城（76）
六十后方医院临时医务所见闻点滴……刘梅松（8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回忆我参加湘乡民众训练的情况……张四维（83）
湘乡解放前教育行政机构沿革……吴砾星（91）

解放前湘乡的四家银行……毛豫谦（93）
湘乡南货业史话……葛顺荣整理（95）
解放前湘乡的三大社会毒瘤——妓院、烟馆、赌场……
……龙继绪（99）

湘乡近百年大事记与重要人物简介……
……湘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104）
湘乡县清末知县及民国知事、县长一览表……
……丁华巨整理（183）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湘乡同学录……彭崇熙整理（189）

我和中国托派相处的日子（之一）

——归国——

斯 施 云

当我写这篇一生中难忘的一段经历时，我就想到列宁、卢森堡、赫尔岑的几句名言。这里把它抄下来，作为我这篇“回忆”的卷头语。

我们需要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真实”不应该以它将为谁服务而转移。

——列　宁

自我批评——无情的，尖锐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评，是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能够生气勃勃的阳光和空气。

——卢森堡

充分的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赫尔岑

中国托派的产生，根植于莫斯科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

执委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对苏联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是1925年——1927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中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以及列宁主义学院留学分批归国的学生。然而对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托派活动，什么时候建立组织这两个重大问题，在我所见国内出版的一般文史资料中，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中国正式出现托派组织是在1928年”。见《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16期《中国托派历史情况简介》，作者郭雄、高荣光。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版。

2、中国托派“成立于1929年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国托派的产生与灭亡》，作者濮清泉，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3、“成立于1928年——1929年初”。见《中共党史资料》1928年第一辑《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作者刘仁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

4、“中国托派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是193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见《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作者盛岳，美国出版。国内有该书的内容介绍，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24期，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印，作者姚维斗。

5、还有人说：“1928年初，他们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托派的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在两年后的另一篇文章里又说，“在1928年12月于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一个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

宁主义反对派”，把“年初”改成“年尾”。前者见《反对早期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斗争》（上），刊载于198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后者，见《在三十年代中国党清除托派的经过》，刊载于1986年上海出版的《革命史资料》第一期，作者唐宝林。

上述这些史料的笔者，有的是专题研究现代史“中国托派问题”的多产作者；有的曾是中国托派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如刘仁静①，是中国托派中唯一会见过流放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并自命为中国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领导者；盛岳②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中大于1930年秋破获托派秘密组织时，他曾参加过对托派学生的秘密审讯工作。为什么连他们都不能确切地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造成的。这还得从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的组织机构的建制说起。

中大在校长之下设置了三个机构：秘书处、总务处和教务处。秘书处相当于校长办公室，在全校有它独特的地位。它跟共产国际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有紧密的联系，在工作中需要有机的配合。它要遵循共产国际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对中大学生进行安全检查，在必要时还可秘密逮捕“反党”学生。它还要做大量的安全保密工作，并负责从国外接运学生和通过秘密线路，把离校学生送往某一目的地。

为此，秘书处就必须较全面确切地摸清每个学生的底细。1927年秋，中大第一届毕业学生遣送归国的前夕，在一周内全校学生都接受了详尽的体格测检：身高、头部大小、耳鼻眼目的相对位置、颈长、头发的颜色和形态、以及每个人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生理上可供识别的特征，如伤痕、疣、痣及其瘢疤等等，都作了纪录，装进每个人的档案袋。

学校秘书处不但对进出国境线的学生要严加控制，即使对苏联境内流动的中大学生，也要采取特殊措施。如1928年初秋，在莫斯科郊区召开中共六次代表大会时，共产国际指令中大秘书处在学生中物色人选，派去一个为大会服务的秘书股。而他们回校后谈，离校时，都不知道去何地，干什么，上火车后才认清同去的伙伴；到达目的地时，还不知道是召开中共六大的会址。至于1927年冬到1929年秋冬分批归国的中大托派学生，完全要受学校秘书处的安排与控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的中国托派学生，自1928年秋冬成立秘密组织后，采用地下工作的组织系统，相互间没有横的联系，一般都互不相识。我除认识耀斌的和公开暴露身分著名的陶福和陈琪二人外，校内其他的托派学生，我是直到回国后在上海成立第一个"我们的话"这个托派组织才认识一部分。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搞托派活动，我当然无从知道，更不要说局外人了。

基于上述情况，其所以对在中国什么时候出现托派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成立托派组织的问题，一时难以作出统一的回答，也就可以理解了。

正如《中国托派组织的历史沿革》的作者③所说"中国托派问题，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复杂问题。"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写好这篇文章，竭尽心力，广征博引，收集了国内外有关的大量资料达四五十种之多，其中有托派的国外资料《国际通讯》，有八篇"未刊稿"，

还有与作者交往的通讯以及法院的起诉书，因而该文的“注释”，竟占全文篇幅的二分之一还多。但根据我亲身经历所知，也许因为他所引证的某些资料的质量问题，在记述中对有些问题仍与事实不符④。

关于我和托派的组织关系问题，以及我和其他有些人的真假姓名、笔名、化名等等问题，在有些资料上，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情况也还存在。⑤

鉴于上述有些史料中所出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为一个亲身参加过“早期”中国托派活动的我⑥，应该有义务实事求是地竭尽可能写点什么，借以提供给一些文史工作者，特别是专题研究这个问题的现代史专家，作为准确了解某些问题的参考。下面先让我谈谈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归国情况吧。

我是于1928年底从莫斯科中大归国的第二批托派学生之一⑦。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两年毕业，这正是我们第二届毕业学生归国的时候，当时被遣送归国是正常的。由于中大第二届毕业的学生都是国共合作时期进校的，除一般的党团员之外，既有极右的国民党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有极左的反对斯大林的托派分子，成分复杂。故在“四·一二”事变后，米夫接替拉迪克为中大校长时，就于1927年9月将一批一般国民党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如张镇、鲁佛、谢振泰、何汉文等遣送归国。又于1928年初将全校著名的托派骨干分子闻岳、陈琪流放西伯利亚劳动改造。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参加反斯大林游行示威的中大托派学生，如梁干桥、陈逸谋、区芳、宋逢春等也于1927年冬被遣送回国了。现在我们这批遣送归国的中大学生，仍然成分复杂是

可以肯定的。因此，学校秘书处对我们的遣送，必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时，我也焦虑地等待组织上对我的安排并考虑自己今后的命运。

学校秘书处过去对托派学生的处置，不外是三种办法：一是象陈琪、阎岳那样流放西伯利亚；二是保留组织关系跟一般党员一起遣送归国并向组织介绍情况分派工作；三是象1927年冬第一批被遣送归国的梁干桥、陈逸谋等人那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遣送归国，不予介绍转接组织关系，弃置党外，放任不管。

按我的情况看：

（一）我当时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苗子正，出身好，而且还是个在国内参加过连续两年之久的地下工作的共青团员。同时，我原来文化水平较低，在校除认真学习政治外，还花了一部分时间自学文化课，在刻苦学习上是全校较拔尖的学生。

（二）两年来，我在班上较为突出，一直受到学校团委书记兼俄语教师爱泼斯坦的器重，并由她安排曾作为中大全体共青团员的代表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由蒋经国充当我的翻译，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过话。也因为我在小组讨论会上常常拥护托派的观点，特别是在“四·一二”事变以前，在讨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时，我就拥护了托派的观点。但如果说这是出于我当时思想认识上有什么理论的依据，倒不如说是因为直觉地受了中大校长兼“中国革命问题”主讲的拉迪克的影响。是他，常在讲台上以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论证，雄辩的口才，构成了令人难以抗拒的威慑力，使你不能不信服他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总的说来，他的观点和托洛茨基一致，但他有独立的见解，在很多政策与策略上和托洛茨基有过分歧，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曾提出："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国际组织。拉迪克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我。"⑧

（三）从学校看，我还算不上是个托派的积极分子，没有参加过1927年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大会托派反对斯大林的游行活动，也没有在全校性的大会上，象闻岳、陈琪、蒋经国那样激昂地发表过托派的言论。

（四）直到拉迪克的校长职务被撤、离校，我仍然是班上的团小组长，尽管1927年12月联共十五大，正式开除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迪克及75名反对派的积极分子的党籍，在党内宣布托洛茨基派为非法；在学校里改由米夫为校长并扶持陈绍禹（王明）登台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把学校中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大会反斯大林的游行活动的托派学生梁干桥等遣送归国，把在校的托派骨干分子闻岳、陈琪予以监视软禁，而对我也不过只撤销了团小组长职务而已，直到毕业，学校在托派问题上并没有给过我任何处分。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估计对我的处置理应属于我上面所提的第二种的。

在考虑组织上遣送我归国安排的同时，也联想到归国的路线问题。因为当时在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一般的留俄学生通过中苏边境线，都是要担当一定的风险的。

中大1927年第一届的毕业生归国，由莫斯科起程，一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比较保险的，那就是把自己扮成一个道地的留洋生或富商，取道欧洲。但这是极少数的，也只是高层次的中共领导人来往的路线。

第二条是乘国际快车，即挂有餐车的豪华列车，行程9天，经西伯利亚由满洲里进入中国国境。

第三条是乘西伯利亚直达海参崴的快车，而速度并不快，没有餐车。走这条路的人，基本上都是转海轮往上海的。如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那批自动申请归国的国民党员以及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弟都走的这条路。而一般的中共党员或团员，就须在距海参崴一站名叫双城子车站的地方下车，然后再从双城子转车往西到达离中国边境不远的五站下车待命。在五站，组织上建立有非常秘密的专门机构，安排偷入中国边境。当然，我们归国的路线，全不能由自己选择，但可以断定第一条路线于我无缘，第二条路线也不可能，当然只有走第三条路线中一般党团员走的那条路线了。

启程归国的日子终于到了。

临走前，学校秘书处给予我们极短的时间，清理最简单的行装，就迅速集合在指定的地点领取车票与旅费，然后由一个陌生的俄国人带领乘车去火车站。进站后，见到了已先我到达的葛颂谔。他比我大几岁，初到中大时，同班学过俄语。他为人秉性真挚、坦率、热情，不爱多言，但一说话，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分班后，一直很少和他交往，但知道他跟同班的托派学生肖祥彬、宋逢春很亲近。记得有一次在中大我看到一份托派文件（记不清是季诺维也夫的《断了线

的风筝》还是《不得已的答复》），就是宋逢春取自他的手里转给我的。现在和他作伴归国，就一起原宪的疑虑和怅惘。

上车后，才知他和我一样匆匆而来。他说，临走前有人告诉他，我们此去海参崴一定要住进指定的旅店，到时候就会有人来跟我们接头，安排下一站归国的旅程。

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几乎要半个月。时值严冬，列车上又不设餐车，一日三餐，都要靠自己在沿途停车时下站去采购、储存。特别是下车到站上设置的水塔前排队打开水是件苦事，去慢了站在队伍的末尾，就不一定能取得开水，而且还有赶不上开车时间被中途抛丢的危险；走快了，脚下冰封三尺，路滑难行，又怕跌伤。回忆前两年也是严冬季节，我从海参崴乘车到莫斯科的中途在西伯利亚，就经受过一次这样的磨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我向老葛重提旧事，他听了拍拍胸脯对我说："老弟，我们患难与共，车上的吃喝全包在我身上，不要怕，路还远着呢。"就这样，我俩安全地到达了海参崴。

在海参崴，我俩住进了在莫斯科早就被指定了的旅店。不久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先住进这旅店的已有我们几个中大同届同学。他们都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其中就有跟我们同班的黄埔学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郑介民和陈国琛。据了解，他们正在等待中大的其他归国学生乘船回上海。当晚，我俩在旅馆里见到莫斯科驻海参崴调遣安排中大归国学生的负责人。他交待说："明天你们在海参崴休息一天，后天就跟住在这里的其他中大同学一起搭海轮回上海。明晚八时后不要外出，定会有人给你们送旅费和船票来的。"

郑介民、陈国琛，在和我同班的日子里，关系并不融

洽，而在“四·一二”事变以后，我们之间“短兵相接”的那种紧张状况是可以想见的。可是现在学校当局把我俩安排跟他们一道送回国，这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很明显，这只不过是学校当局除过去用流放、软禁、秘密逮捕入狱等手段处置托派学生以外对我们又一种处置手段：这就是交给国民党右派分子，带到上海，借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来处置我们。而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

当我把这生死攸关的问题向者葛提出时，他却面无惧色笑着对我说：“革命嘛，岂能怕死。死了还有我跟你作伴。说实话，跟我走，未必条条都是绝路。到时候再看吧。今晚你一定要睡好觉，明天让我们在这次留俄的最后一天尽情享受一下异国风光吧……。”也许那时候，我年轻，“初生之犊不怕虎”，当晚我的确睡得很好。原来他要我今晚睡好觉，为的是养精蓄锐，好在明晚带我去闯另一条孤军奋战生死难卜的偷越国境的险道。

第二天，我们到中国餐馆饱餐一顿以后，他叮咛我说：他要另外去找一个人，要我回旅馆等待，不要外出。约两小时后他回来了，才小声地把今晚搭火车从海参崴倒回双城子站，另辟小道私越国境线的计划告诉了我，并随手给了我一张到双城子的火车票。后来在去五站的火车上，他又告诉我，莫斯科中大秘书处派驻海参崴安排遣送归国学生的负责人之中有个叫黄中美的⑨，我就猜想这一定是他在海参崴另外去找的那个人了。提起黄中美，对他我并不十分陌生，虽然在中大我跟他没有多少交往，可早在1924年杭州举行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时，在讲台上高声演讲的，在游行队伍中带头高呼口号的，除了宣中华、沈定一以外，就算他了。他

是中大第一届毕业的学生，俄语学得很出色，毕业后，取得领导的信任，一直围绕在学校秘书处的周围担任机要工作。从这次老葛跟他的暗中交往，可以想见：第一，他也许早就是一个中大没有暴露身份，而今又和莫斯科秘密的托派组织取得联系的托派人物；第二，老葛在莫斯科临走前得到中大托派秘密组织的授意，才可能在海参崴跟黄中美接上头，并从他那里获知这条得以安全越过国境的路线。

当天下午，我俩到大街各人置备了一套长棉衣棉袄及干粮，把自己打扮成商人模样，晚间十时许，带着简便的行李，告别了海参崴，乘火车去双城子转车，在拂晓前到了五站。

从五站越过国境线的距离虽不很远，但是中俄双方的边防军都设岗哨守望，并都有骑兵日夜沿线巡逻。双方严加防范的地段，正是我们去经受严峻考验的地段。我们先到火车站把行李托运到进入国境后的第一站——绥芬河，再由老葛带我到了一个当地华侨开设的小旅馆，进去后我便意识到这里住的是一些在国境内外经营走私活动的人，而这个小旅馆也正是为他们提供方便而设置的，对外保密、对内开放的“中转站”。显然，此次老葛下车后能毫不费力很快找到这个“中转站”，也完全是他早在海参崴由黄中美所交待的。

这个站的设备简陋，大房间、单人铺，而住宿费却要价很高。若你要偷越国境，就得默默地去内室找经理登记并缴纳引路费，作为带路人的酬金。这笔酬金看来比较高，但带路人所承受的风险也的确不小。我们这次登记的约有十二三人，经理指定我们住在一间较大的房子里。我们按旅店规定的时价，各买了一顶风雪帽，三个麻布袋，把麻袋剪成小块，临

是前用来捆扎双腿，并裹紧肩背。就这样，我俩在到五站后的第二天，和其他旅伴一样，做好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于午夜时分出发。

带路的是个东北人，约四十多岁，体格魁梧，手里拿着一根粗壮的拐杖，显得威风利索，令人望之生畏。临出发前，他认真严肃地告诫我们说："此去路程虽不很远，只要大家谨慎一些，不出事故，天亮前就可过境，但说实话，我带领你们走的这条路，是条'近路'，也许是条'远路'，是条'活路'，也许会是条'死路'。当然，我一定要凭自己的良心，下大力，把'远路'带成'近路'，把'死路'带成'活路'。可是你们都该知道，我们面临的，不论远、近、死、活，条条路都被深深掩埋在皑皑的雪里，是冰窖，也许是雪坑，随时有陷下你的可能。所以，我们只能一靠'皇天'，二靠'土地'，三靠我这根宝杖领先探索，步步落到实处，最后还要靠每个人的这双脚。请大家都要保护好这双脚，靠它在看不到路的地方踩出自己要走的路来。现在，我们就要出发了，这里，我要求大家，步步紧跟在我的脚后，个个要象我手里这根宝杖那样，或进或退，或左或右，都听从我的使唤，只要你我协力同心，一鼓作气，那么我们向前突破难关的冲劲就大了。"

他说完话，从腰包里掏出一对蜡烛一股香，点燃了插在雪地上，要我们这些闯关的"勇士"，虔诚地跟着他面向蓝天叩了三个头。然后，就在严肃的气氛中出发了。

正如领队人先前所说，我们这支闯关的小队，还没等到天明，在中途"几经折磨"⑩以后，总算越过了中俄双方边防军严守的警戒线，小心翼翼地跨进了祖国的大门。

注释：

①刘仁静，曾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与陈独秀一同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毕业于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他在毕业归国途中，特绕道经土耳其专访托洛茨基，并给中国托派带回由托洛茨基手拟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等重要文件，对促使中国托派各小组织趋于统一起过一定作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落实政策更名为刘亦宇，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于1987年3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②盛岳，原名盛忠亮，1923年——1926年就读北京法政大学。曾任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秘书，从事学生运动。1926年冬被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成为中大有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毕业后被留校工作。1930年秋，被派赴苏联远东区工作。1932年8月调回莫斯科，于是年冬归国。1934年6月21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作声在上海被捕，盛接任李的职务，于1934年10月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解放前夕去国外，现住美国。

③唐宝林，现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工作。是一位多产作者，曾先后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中国托派的历史沿革》、《反对早期中国托派反对派的斗争》、《中国部分托派人物简介》以及《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等著作。

④如对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成立的时间及其“总干事会”的成员姓名与事实有出入；在莫斯科红场

举行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参加反斯大林游行而被遣送归国的托派学生人员与实际不符；所述广西发展托派组织的情况与事实也有出入等等。

⑤有的资料所列中国托派的名单中，因不知一个人的真名、化名的底细，误把一个人变成了几个人；有人把“我们的话”的成员死在曹河泾监狱里的区芳，误作为被广西桂系军阀在王公度托派案中枪决的区渭文；也有说区芳在上海托派的所谓中央被破获时，逃之夭夭，杳如黄鹤；有人说“我们的话”的梁干桥，出席1931年在上海召开托派“一大”会议后没有几天，觉得托派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前途，就去南京做官去了。还有事实上全与托派无缘的许多人也列入于托派的名单之中了。

⑥斯大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到：“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一个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因而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这里我所提的“早期”这个词的概念，就是根据斯大林的这句话来划线的。因为我参加托派活动的时间，正终止于1930年因在上海参加“五卅”五周年纪念活动而被捕入狱，从此脱离了托派组织。至于在国内有人提出的托派的“早期”活动所指的“早期”这个词的概念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⑦唐宝林在《中国托派组织历史沿革》一文说我是与1927年参加红场反斯大林游行的托派学生一同归国的；盛岳在《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我是1929年9月归国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我是1927年底归国的。这都与事实不符。

⑧见列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派拉贾书局1962年二版）第19页。

⑨黄中美，归国后我未见其与托派组织有过联系。他归国后长期追随蒋经国成为太子系的重要骨干。

⑩这里所提的“几经折磨”，可说是造化之神对我一次深怀恶意的捉弄，作为我个人的“画龙”来写。其中有三个镜头原拟多动几笔，奈眼下心力不济，只得暂且从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